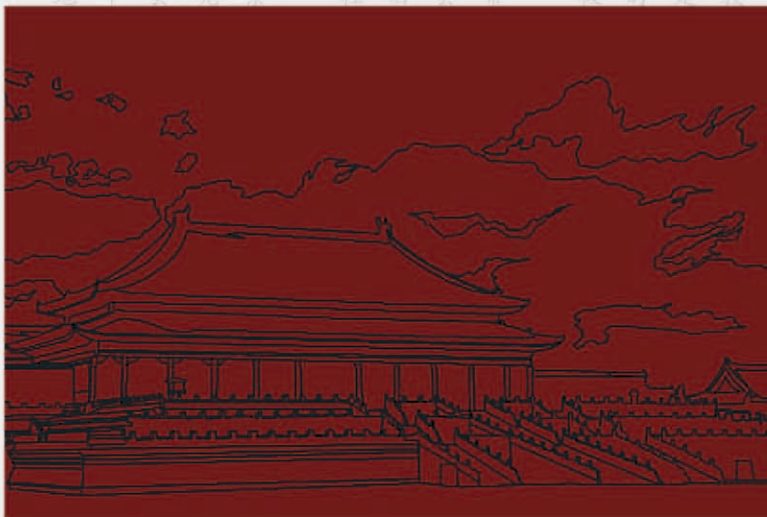


明(1368—1644)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等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时期,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成熟,各个方面都取得长足的成就,是当时的亚洲中心和世界的新中心。同时,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各个领域呈现出各种新因素,新旧交替的冲动,长期的冲击,因此,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一直非常繁荣,研究成果多,研究队伍庞大。目前,明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形成一支研究队伍,有300余人,研究在国内外古代史研究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

2018年 明史研究报告



主编 何孝荣 李小林 庞乃明 敖 堃

纵观2008年中国明史研究,其鲜明特点可见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域全面,研究成果丰硕。2008年的中国明史研究,学者们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流、人物、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与研究等明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与这些领域相关的小领域也多有学者着墨。如明代政治史领域研究成果又包括政治生态(中央政局、地方政局)、政治制度(政府机构与官职、政府运行机制、礼仪制度、选举制度、僧道官制度、边疆治理制度)、政治事件、政治思想、进士群体、法律制度与思想、皇权与藩王权、明朝灭亡问题、农军起义政权等各小领域的研究成果。明代经济史领域研究成果又包括经济史、财政(中央及地方财政收支与转型)、赋役、白银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学科和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资助

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

主编 何孝荣 李小林

庞乃明 敖 堃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 / 何孝荣等主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310-06021-4

I. ①2… II. ①何…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报告—
明代 IV. ①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0303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
2018 NIAN ZHONGGUO MINGSHI YANJIU BAOGAO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230×170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1插页 288千字
定价:68.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833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2019，时近岁暮，我们的《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终于定稿，即将交付出版。此刻，既有全书完稿的喜悦，也有拖延至岁暮的无奈。

一

明（1368—1644）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极为成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是当时的亚洲中心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同时，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社会各领域呈现出各种新因素，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迈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因此，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一直呈现出繁盛景象，研究成果多，学术活动频繁，研究队伍庞大。目前仅中国明史学会在册会员就有500余人。可以说，明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版图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

纵览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其鲜明特点可见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域全面，研究成果丰硕。2018年的中国明史研究，学者们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关系、对外交流、人物、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与研究等明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与这些领域相关的小领域也多有学者着墨。如明代政治史领域研究成果又包括政治生态（中央政局、地方政局）、政治制度（政府机构与官职、政府运行机制、礼仪制度、选举制度、僧道官制度、边疆治理制度）、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官员进士群体、法律制度与思想、皇权与藩王权力、明朝灭亡问题、农军起义政权等各小领域的研究成果；明代经济史领域研究成果又包括经济政策、财政（中央及地方财政收支与转型、赋役制度、白银货币问题）、农工商业与区域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区域经济与城市化、水运交通与城市水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与关税、外贸货物、外贸港口、海商研究、朝贡贸易）等各小领域的研究成果；明代军事史领域研究成果又包括军事制度（卫所制度、军镇与营兵制、

军法制度、武官制度以及其他军事制度)、海防与边防(海防问题、边防问题)、军事经济与技术、军事社会与文化、军事人物及家族、军事地理(城池及长城、交通)、军事文献、战争史、学术热点等各小领域的研究成果。举凡明代社会的各个大小领域,2018年基本上都有学者加以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论著。

2018年学者们的明史研究成果数量也是空前的。根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政治史研究出版专著9部,研究论文170余篇;明代经济史研究出版专著10余种,发表论文160余篇;明代军事史研究出版专著4种,整理出版史料文献4部,发表学术论文近140篇;明代社会史研究出版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230余篇;明代文化史研究出版专著10余种,发表论文超过300篇;明代民族关系研究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110余篇;明代对外交流研究出版专著5部,发表论文130余篇;明代人物研究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170余篇;台湾地区的明史研究出版专著15种,发表论文145篇。除去明代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研究、明代文献出版与研究未有统计以外,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共计出版专著80余部,论文超过1550篇。即使去除一些论著研究内容横跨几个报告而在各报告中重复计数之外,其数量也是惊人的。用成果丰硕来描述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成果一点也不为过。

第二,不少研究成果能够发掘新史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例如:明代经济史研究涌现了许多运用经济学、统计学、法学等研究视角以及地方文书、新出土文物、外国史料等新材料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人们对明代经济的总体认识;全球视角下以白银为中心对明代财政转型的探讨,贯穿明代国家经济、对外贸易、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认识明代国家地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代军事史研究方面,不少论著能够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新视角、新理论;而在新史料应用上,尤其是对近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集中考古发掘出的大批金银、货币、金册等的考究,大大推进了对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部、明代册封制度、明末清初四川社会等的研究。明代社会史研究在发掘新史料、运用新研究方法和角度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情感史研究结合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史料来源除传统史籍以外,更多的采择野史笔记、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别开生面。明代文化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将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常用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社会风俗领域的婚姻、丧葬等方面,运用心理学来分析宫廷生活参与者的心理和生活状态,以了解明代宫廷文化的基本状况,研究视野逐渐拓宽;有关科举、书院教育等的相关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并运用大量新材料对其进行探讨,如族谱、文书之类的新材料被更多地引入地方文化研究中。明代民族关系研究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也大量使用新史料,如近年兴起的土司学推动了土司和民族关系研究。明代对外关系研究在近年国家大力推行“一带一路”的倡议下,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获得了学

术界的较多关注。在明代中西交流研究方面，学者们此前主要关注和研究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但是 2018 年明代中西交流研究则更多关注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台湾地区的明史研究，多能打破文史哲和艺术文物学的藩篱，讲究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关注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与艺术及宗教，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军事及制度史，即使研究制度史也不再做静态制度的铺陈，而是注重制度的运作。总之，通过发掘新史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第三，出现一些研究热点。中国明史学会及各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经常就一些明代制度、事件、城池堡垒、知名人物、考古发掘资料等召开学术研讨会，加以集中讨论，出版论文集，形成研究热点。2018 年因会议形成的明史研究热点，如《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 年）收录了不少有关明代云南治理的论文，明代云南研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再如考古发掘新资料的出现，往往也会形成研究热点。最突出的事例，是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使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部、明代册封制度、明末清初的四川社会等的研究成为 2018 年的研究热点。还有因一些论著出版而引来的学术界讨论，也会形成研究热点。如关于“明清歌家”的研究和讨论，2018 年仍在进行。再如《史学月刊》2018 年开设“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专栏，刊发专文，也引起并将持续引起相关讨论和研究。总之，研究热点的出现，表明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走向集中、深入、多层次，推进了明史研究。

当然，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为选题上通史性论著缺乏，探讨宏观议题者较少，研究碎片化明显；在研究角度和方法方面，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仍是主流，多学科交叉、活的制度史、社会文化史等尚待进一步推广；在内容和观点方面，不少论著创新性不足，“炒冷饭”乃至重复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总的来说，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尽管有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成绩还是主要的，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

南开大学的明史学科，是由 20 世纪 50 年代郑天挺先生奉调来南开大学后创立的，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辉煌时期。明史研究阵容强大，研究人员分布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古籍研究所及社会学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南开学报》等各单位。21 世纪初，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所、古籍所等合并成立历史学院，明史研究在南炳文教授的带领下，在学术界保持领

先地位。目前，我们在职的明史研究人员有六位，均为教授职称，在学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 30 余人。

近年来，我们除了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还多次召开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海内外许多明史研究专家来南开大学讲学，每年举办一次京津（沪渝）明史研究生论坛，创设“南开明史学”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每周推送南开大学老师、同学（包括毕业生）的明史研究论文以及南开明史研究资讯（包括会议、讲座、毕业论文答辩、论著出版资讯等），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是中国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也往往被用来描述学术研究综述的作用。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创新与继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创新离不开继承，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而科学研究的继承，首先就要对前人、同时代人的相关研究有透彻的了解，以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于是，学术研究综述就显得颇为重要。

我们编写这部《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缘起 2017 年 11 月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向全校各学院征集年度研究报告书稿。当时，我申报了《2017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希望对 2017 年的中国明史研究状况做一个总结，为以后的明史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推动明史研究的创新发展。这个项目通过历史学院评审后，递交到学校社科处。但一直到 2018 年 11 月，才接到获批通知。那时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学，项目组其他师生也因未能提前准备，来不及撰写书稿，所以最后只好放弃。

2019 年 3 月，南开大学社科处再次征集年度研究报告，我又申报了《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幸好，2019 年 6 月，社科处通知我项目获得批准。于是，我迅速和本学院“中国史学科和学术团队建设项目”之下的“明史及明清政治文化史学科和学术团队建设项目”小组的 3 位同仁——李小林教授、庞乃明教授、敖堃副教授协商，计划运用本小组不多的经费资助编写《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并得到一致赞同。这样，我们确定了分工，各位老师选择门下的博士生、硕士生数名组成编写组，先由学生撰写初稿，导师负责修改，最后由我统稿。台湾地区的明史研究部分，我邀请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徐泓先生撰写。

《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初稿完成后，2019 年 10 月 13 日，我们召开了专家评议会，邀请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肖立军教授、吴德义教授、张献忠教授对初稿加以评议。会上，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不少修改建议和意见。会后，各位作者根据专家们的修改意见，又加以进一步修改完善。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最后一篇研究报告历经 6 次沟通修改终于交稿。此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通读统稿，最终定稿。

三

《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共分为明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与研究、人物、民族关系、对外交流，以及台湾地区的明史研究十一个部分，合计24万余字。原来我们还设计有研究热点、研究不足两个部分，但是因为其内容与前面部分内容有重复以及时间不足，最后没有撰写。

我们希望通过编写、出版本书，对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总结，并分析不足，既为学术界提供相关资讯，推进中国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锻炼南开大学明史方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提高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助力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双一流”建设。另外，我们也希望，以后每年的中国明史研究报告能够持续编下去，形成系列，成为南开史学的一张亮丽名片。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编写《中国明史研究报告》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没有经验，加上学术功力和见识不足、时间不充裕，所以对2018年中国明史研究的总结仍不到位，甚至不乏错误，书中的问题和不足还有很多。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给予批评指教，以利于我们提高和进步。

本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管理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常务副部长管健教授、宫立杰老师，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副院长余新忠教授和卞利教授等不断给我们以督促和鼓励。对于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何孝荣

2019年11月25日

目 录

2018 年明代政治史研究报告	1
一、研究述评	1
二、政治生态	2
三、政治制度	5
四、政治事件	13
五、政治思想	15
六、官员、进士群体	16
七、法律制度与思想	18
八、皇权与藩王权力	21
九、明朝灭亡问题	22
十、农军起义政权	23
2018 年明代经济史研究报告	25
一、学术会议与相关研究综述	25
二、经济政策	26
三、财政	28
四、农工商业与区域经济	33
五、对外贸易	45
六、结语	50
2018 年明代军事史研究报告	51
一、军事制度	51
二、海防与边防	56
三、军事经济与技术	59
四、军事社会与文化	60

2 2018 年中国明史研究报告

五、军事人物及家族.....	62
六、军事地理.....	63
七、军事文献.....	65
八、战争史.....	67
九、研究评述.....	68
十、学术热点：张献忠与江口沉银.....	69
2018 年明代社会史研究报告.....	71
一、学术会议与研究综述.....	71
二、区域史与地方社会.....	75
三、社会群体.....	80
四、家族史.....	86
五、礼俗、信仰与日常生活.....	91
六、人口、医疗与环境.....	96
七、学术热点.....	103
八、结语.....	104
2018 年明代文化史研究报告.....	105
一、哲学.....	105
二、宗教.....	119
三、文化教育事业.....	122
四、宫廷文化.....	125
五、社会风俗.....	125
2018 年明代民族关系研究报告.....	128
一、学术会议及研究综述.....	128
二、边疆治理研究.....	129
三、土司研究.....	132
四、族群、移民与民族交流.....	136
五、民族地区的经济.....	139
六、民族地区文化和习俗.....	141
七、民族人物研究.....	143
八、民族间的和与战.....	145
九、结语.....	146

2018年明代对外交流研究报告	147
一、封贡体制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交流	147
二、郑和下西洋、陆海丝绸之路和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交流	157
三、欧洲势力东来和明代中西交流	161
2018年明代人物研究报告	170
一、明代前期人物	170
二、明代中期人物	175
三、明代后期人物	182
2018年明代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研究报告	186
一、明代文学	186
二、明代艺术	199
三、明代科学技术	204
2018年明代文献出版与研究报告	208
一、明代文献整理出版情况	208
二、明代历史文献研究进展情况	212
2018年台湾地区明史研究报告	217
一、前言	217
二、两个推动台湾地区明代研究的相关学会	218
三、“科技部”学术补助奖励	224
四、专著与期刊论文	225
五、学位论文	228
六、结语	232

2018 年明代政治史研究报告

李小林 闫福新

明代政治史在明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内容相当丰富，发展、演变也极为复杂，有着进一步深耕和挖掘的潜力。这在 2018 年明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中也有所体现。据不完全统计，该年度共出版政治史研究专著 9 部，研究论文 170 余篇，研究内容包括政治生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进士或官员群体、法律制度与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农民起义政权研究等多个方面。现将 2018 年度明代政治史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一、研究述评

2018 年有多篇研究综述和书评涉及明代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研究。赵世瑜《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 年第 1 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明代政治制度和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概括分析，指出政治制度探究在重视内阁等研究的同时，研究重点开始从国家的制度设计向权力的运作转移以及关注制度创设背后的人或人群的活动；法制史研究也不断深化和细化，注意律条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差异及断案复杂性等。程伟《20 世纪以来乡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档案》2018 年第 1 期）涉及诸多明代乡试的研究，包括贡院、乡试解额、考差、命题和评卷等，指出乡试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诸多相关制度以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敏政《1925—2015 年明代茶马制度研究述评》（《农业考古》2018 年第 2 期）梳理了不同时期明代茶马制度的研究视角和特征，在充分肯定前人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指出需要加强

诸茶马司和巡茶御史、茶马制度与马政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以及对地方志、明代茶马专著等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运用。李亚娟《近 40 年来明代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研究综述》（《陇东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对整理出版相关史料及专著，甘青藏区实行过土官土司制度的真实性，土官与土司两个概念的辨析，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制度形成的原因、类型、特点，土官土司的来源及演变，甘青藏区土官土司家族个案分析等进行总结概括，指出其与南方土司制度研究相比略显薄弱，研究缺乏综合性、整体性等。

郑小春《徽州诉讼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徽学》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通过对法律文化、司法制度、地方社会、诉讼资料四个方面的分析，指出徽州诉讼尤其重视以司法制度以及利用诉讼文书开展地方社会的研究，其在民事诉讼、基层司法制度、各种诉讼参与人研究等方面尚存在很多亟待拓展的空间。刘少华《明代判牍文献研究综述》（《兰台世界》2018 年第 10 期）指出，明代判牍文献在司法制度和社会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需要在文献搜集、资料鉴别、研究范围、深入程度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姜珊《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评介》（《中国档案研究》第六辑，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 年）指出，该书从明代皇帝文书的种类、使用方式和形成过程中的相关制度方面展开分析，重视档案与史料运用，重视从皇帝文书角度阐述文书制度，为之后的相关研究在写作内容和手法上提供一些借鉴。

二、政治生态

本部分主要是针对明代整体或某个时间段的政局态势的探讨，折射出的是一个王朝或地区政治生活的大环境和大趋势。

1. 中央政局

以中央政局为视角对整体或阶段性政局态势进行考察。李佳《君臣关系与明代士大夫政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 年），通过分析明代不同时期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以及交往过程中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指出在明代皇权强固的情况下，士大夫政治依旧活跃，在政局中不断尝试主导国家的政治走向，其话语权几经沉浮，甚至产生权臣政治，因此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不断进行反思，在忠君基础上也重视国家社稷，甚至产生限制君权的思想，体现出其深刻的政治责任感。

孙鸿敏《诏狱之变与明前期政治》（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通过对洪武至天顺时期诏狱对士人的压迫的考察，指出其是皇帝打压士人和宦官干涉朝政的重要工具，具有强随意性和弱程序性的特性，它也成为探究皇帝、宦官以

及大臣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朝堂权力关系格局的变化。李小林、李俊颖《明宣宗时期政治生态环境述论——以部院大臣为中心》（《南开学报》2018年第4期）从明宣宗时期的六部和都察院堂上官的构成及选任情况分析出发，指出宣宗在部院大臣选任方面主要依据其在原任的良好风评和政绩，且官员构成上新老搭配，既有丰富行政经验，也有冲劲和活力，构成了相对合理的人事格局，君臣同心同德，共同营造了一种较为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也是“仁宣之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赵旭《16世纪京畿政治态势探析》（《沈阳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从君主的个性特征和大臣的结党斗争两个方面出发，重点梳理了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五朝君主和群臣的政治表现，并对各朝君主的施政特点和教训进行了讨论。

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格局——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线索的思考》（《求是学刊》2018年第3期）指出，晚明政治史研究需要立足于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以君臣、朝野、官民与明清政治的差异四条线索来展开，这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君主政治制度体系乃至于一种文明类型的理解。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中华书局，2018年）、《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中华书局，2018年）是其重写晚明历史系列的两部重要著作，其中前者以张居正政治生涯起伏为主线，从嘉靖时期内阁交替到万历三大征，聚焦于万历时期的政治变迁、大政得失及人事沉浮，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性格鲜明的万历皇帝和铁腕首辅张居正；后者则以党争为线索，从万历时期“争国本”到齐、楚、浙、昆等地域划分的大臣派系，再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之争，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东林党人的儒家政治理念以及阉党横行的混乱局面。该系列著作以全球史的视野聚焦明后期，在大量相关奏疏、书信、文集、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材料基础上，以大众历史的笔法，将朝廷间的日常细节和宏大叙事相结合，细致地勾勒出明朝在后期走向衰亡的历史画卷。

张玉兴《论南明皇帝及其时代》（《明清论丛》第十八辑，故宫出版社，2018年）以南明皇帝为中心，对南明与清的艰难较量并败亡的过程进行梳理分析，指出双方的实力高下悬殊，南明失败已成必然结果。韩继伟《从亡国悲情视角看南明永历王朝存在的三个时期》（《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将永历朝分为颠沛流离的早期、困顿屈辱的中期、穷途末路的后期三个时期，指出永历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各阶层合力抗清的重要作用。

2. 地方政局

对地方政治生态的探究，以当地政府的治理情况为主。《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收录了不少有关云南治理的论文。其中，彭勇《“军民并治”与“土流兼治”——明代中央治理云南的理念

及其实践论略》指出，明代云南实行军政、民政、军民等三套管理系统，存在流官和土官两种职官体系并存的情况。何先龙《浅述元明滇黔兼治方略》分析了明朝在治理云南过程中主要实行以黔治滇的策略。秦树才、肖婷《从“使其不叛”到“治以不治”：明朝治滇观探析》论证王朝对云南的治理从“使其不叛”到“治以不治”策略的变化轨迹，指出明朝策略的转变最终导致了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的日趋弱化。陈碧芬《从明代治滇方略看云南历史地位的变迁》指出，明政府坚定地将云南纳入全国“大一统”治理的视野之下，为推进云南与内地治理的一体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献忠、崔文明《明代县域治理的实践与困境——以〈袁黄宝坻政书〉为中心》（《史学集刊》2018年第4期）通过分析袁黄在担任北直隶宝坻知县期间进行的行政工作，指出明代县级行政机构管理内容十分丰富，是一种“全能型的政府”，在古代社会人治的主导下，儒家善治理念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宫凌海《明代中后期温州沿海卫所与府县治理》（《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指出，明宣德之后温州当地一些府县官员积极介入卫所管理事务，在司法管理、赋役均平、屯政调整等方面取得主导权，明初“军强民弱”的格局逐步消失，府县官员在通过行政权力不断改变卫所管理体制的同时，也推进了卫所制度的内在转变与地方化进程。袁庆明《明代广西平乐府地区治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指出，明政府通过“以夷制夷”等政策虽然加强了对广西平乐府的控制，但随着明中期以后政治和吏治的日趋腐败，中央与当地的矛盾不断加深，广西乐平府的反抗也日趋频繁，明政府也只能依靠军事征剿维持统治，因此军事高压政策仍是治理当地的主流。

3. 社会舆论

一些学者从社会舆论角度探讨明代政治生态，提供了研究明代政治生态的新视角。以《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发表的三篇论文最为典型。其中，张兆裕《从建言到舆论——明代民情表达方式的变化》指出，从明初的“民情建言”到正德以后的社会舆论，民情民意表达主要方式的转变，除受社会思想多元化和舆论引导群体的形成影响外，还深受朝堂政治变化的影响。张献忠《庙堂与天下：晚明社会舆论与朝廷政治》指出，专制统治下明是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但是随着明末讲学之风和结社的兴起，以及商业出版的发达，明朝文化专制统治有所松动，民间舆论对政治开始发挥较大的影响力。展龙《明代社会舆论的历史意蕴及启示》指出，明代社会舆论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民众意志与集体利益、国家政治与民间话语的集中体现，呈现出舆论主体多样性、演变阶段性、系统独立性、监督制衡性、载体多元性等特征，社会舆论与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机构密切联系，并受到官方重视，成为审视现实政治社会的一把标尺。

三、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研究仍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包括官方礼仪制度、选举制度、各级政府机构以及边疆治理等，其中以政府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为主要方向，中央与地方机构都有所涉及，在政府运行机制研究中对于监察制度和文书制度的考察是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以文书为中心的信息沟通的研究。

1. 政府机构与官职

有关政府各级机构的研究相对较为分散，既有对宦官、内阁、六部、锦衣卫、鸿胪寺等中央重要部门的探讨，也有对书吏、抚民官、驿站等地方机构、官职的探索。

在中央层面上，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论述了明代宦官制度的建立、发展演变、构成、职掌、影响以及宦官史分期等问题，指出明代宦官在中央以司礼监为中心参与中央政治决策，涉及司法权、缉事权以及军权等诸多外政，在地方上则通过“出镇”渗入地方政治和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机构和官职体系。李文玉《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文史哲》2018年第6期）指出，钱龙锡因为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杨嗣昌由于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而遭到舆论谴责，他们作为追责对象，都是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属性决定的，加上当时舆论环境的压迫，内阁职能受到压制，处境日趋艰难。黄群昂《明代兵部考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通过对明代兵部设立沿革、建置与职掌的梳理，指出兵部虽然建制完备，位尊权重，但是权力大而不专，统治效能有限，缺乏对地方兵权的控制，导致地方军务混乱，破坏了兵部统一有序的运作机制。冯志君《明代鸿胪寺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指出，鸿胪寺是明代负责礼仪制度的中央机构，分为南、北两部，其职掌包括礼仪教导、纠举违礼、引见与引奏等，在明代不同时期以及南、北两部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且与礼部、光禄寺间既有职权上的密切合作，也有属权纷争，其人员设置和管理上的缺陷先后导致冗官冗费和属官缺员的问题。张金奎《锦衣卫形成过程述论》（《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对至正十六年到洪武十五年锦衣卫正式成立前禁卫机构的演变过程加以梳理，修正了诸多史书中的不当记载，指出禁卫机构职能从继承于前代的仪鸾司、拱卫司、都镇抚司等多头分担状态到统一于锦衣卫，总体上朝着化繁为简的方向运行。吴德义、单楷《秘书监与明代宫廷藏书管理之关系》（《历史教学》2018年第6期）指出，明代秘书监于洪武初年设立，它促进了当时宫廷藏书的发展，但是随着秘书监的废除，宫廷藏书的管理力量遭到削弱，

管理的专业性降低，呈现出衰败态势，这与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季禾子《明代京城巡捕营探析》（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着眼于明代京师治安管理体系中的巡捕营，指出其设置于弘治年间，主要作用是巡逻捕盗，与城兵马司、京卫等机构相互配合，对维护京城治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等因素的限制，嘉靖以后其职权逐渐被弱化，作用也难以有效发挥。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曾短期存在的中央机构。黄阿明《明初考功监探微》（《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指出，考功监设置于洪武八年，罢废于洪武十八年，主要发挥覆核考核功能，但是随着明朝国家制度和官制的改革，其职权归于吏部，最终被罢废。刘梦雯《明代谏院考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8年第3期）考察了明洪武时期短暂存在的谏院的沿革、建制、职能与特点等，指出谏院的设置是明初为加强皇权、强化监察而进行的一次尝试，随着明君主集权的逐渐强化，其最终被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所取代。

在地方层面上，有对巡抚、巡按御史等省级官职的考察。李耕《明代甘肃巡抚的设置与权责探析》（《河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通过对甘肃地区巡抚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其职权扩大原因的分析，指出巡抚设置使得守边文官正式地方化与制度化，与总兵、镇守太监相互制衡，共同负责甘肃的管理及边防事务。朱冉《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探析》（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指出，明代巡按御史作为中央政府派遣至地方进行定期巡回考察的监察官员，与中央和地方都有密切联系，他们凭借皇权威势到地方后广泛督查地方政务，对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职权定位相对模糊，可能会造成对地方府县的侵权，干扰地方政府有效运行。

有对州县吏员的探讨。范金民、张彭欣《顶首银：明代书吏顶充之探讨》（《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指出，明代中后期书吏在吏役期满出让吏缺时，补缺之人必须给予一定数额的银钱，且签订顶首文契，这种现象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曾严加管制，但却屡禁不止，这与吏治腐败、书吏承充制度规定不完善，以及书吏一职被绍兴地方人群所把持垄断等有很大关系。阚铭霖《明代州县刑房制度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考察州县刑房的设置、职责、工作流程、作用与弊端等，指出刑房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州县官处理司法事务，是重要的基层行政机构，而刑房吏员主导刑房事宜，他们可以侵扰词讼，干扰州县官正常行政，但他们职重位卑，并无仕途升迁指望，因此不少人陷入腐败贪污之中，这反映出明代州县主官负责制的不完善和官僚政治的弊端。

有对地方驿站的论述。赵平略《明朝驿递制度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指出，驿递制度作为府州县与上级政府